

论北宋初期的茶叶贸易法令

黄纯艳

摘要:北宋榷茶制度产生于建隆三年,其始为禁榷自蕲春北销的江南茶。乾德二年扩大为对所有江南北销茶的禁榷。乾德二年茶法仍仅针对江南北销茶,淮南茶的禁榷始于乾德三年。太平兴国二年开始将榷茶制推行于统一后除川、陕、广南外的江南诸路。雍熙三年茶叶首次用于沿边折中,但规模有限,未对茶法产生大的影响。至道二年以前的太宗朝茶法改革的主要问题是解决茶叶停积难售的弊病,为此,端拱二年张洎提出“通商法”,实即贴射法,淳化三年贴射法实行于淮南。淳化四年刘式改革江南法仍是交引法,而不是贴射法,至道初陈恕再改江南茶法,是恢复榷货务卖茶制,不是三说法。刘式、陈恕茶法也是为了解决茶叶停积问题。

关键词:北宋初期; 茶法; 禁榷; 改革

北宋茶叶贸易法令的频繁变动,及其对政治经济影响的加强,主要始于真宗、仁宗朝之后。这一阶段的茶法也最为研究者所关注。实际上真宗、仁宗朝茶法的基本制度就是北宋初期,即太祖、太宗朝茶法的延续。探讨北宋初期茶法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揭示宋代茶法的发端,而且有助于解决学术界对真宗、仁宗朝有关茶叶贸易法令中茶法与入中的关系、三说法和贴射法的性质等几个主要问题的争议。

一、太祖朝茶法的初创和太平兴国二年的茶法调整

在后周世宗于显德五年(958年)据淮南十四州之前,五代中原政权境内均不产茶。周世宗收复淮南十四州后也未实行榷茶。宋太祖建国伊始,仍袭旧制。但建隆三年(963年)开始对江南从蕲春北销的茶叶实行官府垄断经营,该年“以监察御史刘湛为膳部郎中,湛奉诏榷茶于蕲春,岁入增倍。”^①淮南茶及其他地方北销茶并未被垄断。但建隆榷茶使北宋统治者看到了“岁入增倍”的利益。乾德二年(964年)将榷茶制扩大为对江南北销茶的全面垄断,“令京师、建安(笔者注:大中祥符六年改为真州)、汉阳、蕲口并置场榷茶”,“令民茶折税外,悉官买。”^②商人经营茶须“入金帛京师,执引诣沿江给茶。”还制定了私茶的处罚条例:“民敢藏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直百钱以上者杖七十八贯加役流,主吏以官茶贸易者,计其直五百钱流二千里,一贯五百及持仗贩易私茶为官司擒捕者,皆死。”^③可见乾德二年榷茶的方式就是由沿江榷货务垄断收购江南北销茶,然后批发给商人,商人买官茶采用入中买引的“交引法”。

关于乾德二年茶法有一点须加注意,即它只是江南北销茶的榷法。《群书考索》卷56载:“乾德二年诸州民有茶除折税外,官悉市之。”其中“诸州”二字系作者妄加。江南除荆湖新定

外,其他各地此时尚在宋版图之外,宋法令不能及于江南诸州,而江北淮南诸州至乾德三年才榷茶(见下文)。今有学者将乾德二年茶法概述为全国性制度是不当的。也有学者据《文献通考》中“自江以北皆为禁地”,误认为江北已行榷茶。若从《文献通考》中该条史料的完整内容分析,可知“江北为禁地”是指禁止江南商人过江而言。其全文为:“乾德时东南六路闽浙归职方,余尚未平,太祖榷法盖禁南商擅有中州之利,故置场以买主,自江以北皆为禁地。”^④禁商人过江是宋初对江南实行贸易限制的总体政策之一。《宋史·食货下八》载乾隆二年令曰:“禁商旅毋得渡江,于建安、汉阳、蕲口置三榷署,通其交易。”《长编》乾德二年七月乙未条亦云:“江北置折博务,禁商旅过江,诏谕唐主,恐其挟中国之势,有所侵扰也。”禁南北商人过江交易真正目的并不是担心宋朝商人在南方政权内违法侵扰,而是防止南方商人操纵宋朝利权。

乾德三年宋政府对淮南茶也实行了禁榷。该年三月苏晓“建议榷蕲、黄、舒、庐、寿五州茶,置十四场。”^⑤淮南茶的禁榷主要为了财政目的。《玉壶清话》卷二载:“乾德初,国用未丰,苏晓为淮漕,议尽榷舒、庐、蕲、黄、寿五州茶货,置十四场,一萌一蘖尽搜其利,岁衍百余万缗。”由于苏晓榷茶的苛刻,“淮俗苦之”,以致“后晓舟败溺,淮民比屋相贺。”淮南榷茶的方式与禁榷江南北销茶相同,即由政府垄断收购和批发:“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其鬻者皆就本场。”^⑥乾德二年榷茶不涉及宋境内所产茶,故无针对园户的规定,而此时增加了对园户的管理:“置吏总之”,“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官府向园户借贷茶本钱,并可以茶折税:“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茶本钱,又民岁输税愿折茶者,谓之折税法。”^⑦江南统一以后,这一管理园户的制度又被用于东南各路。

开宝八年宋灭南唐,仍沿用南唐旧法,“官市茶十之八,余二分复税其什一,然后给符,听其货鬻。”^⑧官买与通商并行,但通商茶价必低于官营茶,这与江北的榷茶相冲突。商人常“逾江涉淮,乘时取利,紊乱国法,旁缘为奸。”太平兴国二年正月,江南转运使樊若水请“严禁之”。这次茶法调整包括以下内容:其一,对江南“诸州所买茶折税输租如山场。”^⑨即照行淮南茶的管理办法,用户茶由官府垄断收购。各产茶州县就近设置买茶场。咸平三年(1000年)京东路为了减省官府运输费用,在饶州、歙州集中设置买茶场,收购邻近各县茶叶,如饶州场“买纳浮梁、婺源、蕲门县茶”,但增加了园户长途运输之苦,“逐处民俗皆言溪滩险恶,艰阻尤甚,愿各复往日茶仓,就便输纳。”于是诏令“用循旧制”^⑩。可见在产茶处就近置买茶场是太宗朝旧制。其二,为适应江南茶全面禁榷的需要,增设榷货务。由沿江三榷货务增为“于沿江置榷货八务”^⑪。榷货务的职能与以前基本相同,就是负责茶叶批发。只是收购环节由各州县买茶场完成,各州县将所买的茶叶集中运至六榷货务。“江南荆湖两浙建剑诸州军租市茶亦水运计纲分送沿江诸榷货务。”^⑫各务有规定的纳茶州军。^⑬纲运是十分不易的,张洎曾说:“比来般运,尽出公家……陷失茶纲,比岁常有。”^⑭其三,统一了南北茶价。江南茶因受通商影响,“官所市茶,价值未称”,樊若水乃“请稍增之以便于民而利于国”^⑮。其四,制定了新的私茶令。和乾德二年令相比,此次茶令对犯禁者的处罚程度有所减轻,私鬻“十贯以上黥面送阙下,妇人配为针工,民间私茶减犯人罪之半,榷货务主吏盗茶贩鬻钱五百以下徒三年,三贯以上黥面送阙下。”同时增加了对园户毁茶树的处罚:“园户辄毁其丛株者,计所出茶论如法”^⑯。太平兴国三年闽越相继纳土,榷茶制度推行到除广南、四川外的南方各路。“川峡、广南州军止以土产茶通商,别无茶法”^⑰。四川茶至熙宁七年(1074年)才实行禁榷法,广南茶的第一次禁榷则在元丰七年(1084年)。

二、雍熙以后的茶法变动

1. 雍熙入中对茶法的影响及茶法的积弊

雍熙三年(986年)太宗亲征北伐,为供给军需,开始招诱商人赴沿边入中,以茶、盐、现钱等物折中,即史籍所载:“自河北用兵,切于馈饷,始令商人输刍粟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优其直,执文券至京师,偿以缗钱,或移文江淮给茶盐。”^⑧这是茶叶首次用于沿边折中。真宗、仁宗两朝茶法的频繁变动与沿边入中直接相关,茶法交替都是围绕着保障沿边供给和减少折中造成的茶利损失这两个问题。但太宗朝茶叶用于沿边折中的十分有限,直到至道末才出现茶叶大量用于折中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雍熙以后,宋太宗对北伐亲征的失败心有余悸,奉行守内虚外政策,不复言北伐事,军需供给的紧张状况得以缓解,此后,除至道二年(996年)与西夏发生战事外,太宗一朝边境相对安宁,无大的战争。

端拱二年(989年),宋政府又开始令商人在京师入中粮食算请茶叶,在京师“置折中仓,听商人输粟京师,而请茶盐于江淮。”不久因岁旱而罢,“淳化二年(991年)五月复置折中仓”^⑨。而此前商人算茶皆于京师入中金帛。但不论是沿边入中军需,还是京师入中粮食算茶,都未能大规模地促进官茶的销售。因而茶叶滞积难售成了太宗朝当政者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茶叶停积的现象在太平兴国末年既已出现。太平兴国九年盐铁使王明上书言江南积茶之弊。他认为茶叶的陈积不是由于买茶额与卖茶量的不平衡,“荆湖两浙江淮诸州出产茶货处买纳数与卖数比较若不相远”,而是“缘自前收复诸处旧官茶货数多,以至相承接压”,即原南方各政权存留茶货太多,且宋榷茶官吏额外多买,本来买茶“各有旧额,使臣职员务买数多,用为劳绩。”^⑩加之官买伪劣茶,“采选不精,人户启倖,多采粗黄晚叶,仍杂木叶蒸造,用填额数。”“并于额外,别利价钱,名为不及号茶”,于是使官茶“新时出卖不行,积岁渐更陈弱。”^⑪

为解决茶叶陈积问题,端拱二年,太宗令户部郎中张洎主持茶法讨论。“献议者言货茶利害盖有二焉,一曰榷山,一曰放法。”张洎认为实行榷法,“榷买茶货多入无穷,堆贮仓场”,至“大半陈腐,积年之后又多至焚烧。”加之纲运途中“风涛没溺,官吏奸偷”,官府得利大打折扣。他主张实行通商法。他对比了榷茶与通商法下政府的茶利收入:官买茶每斤买价230文,运费约100文,而卖茶价每斤960文,得净利640文,除陈腐、烧弃者实际不及640文;行通商法时,官置务监督商人与园户的交易,每买卖一斤茶,园户纳钱100文,茶商纳300文,茶商在卖茶时再纳200文。官府坐收600文息钱,加上对茶商所带买茶金帛的征税,则“官入茶租与榷山之日所获净利不相悬矣。”且茶叶流通必然扩大,茶利总收入较前更增。^⑫从上可知,张洎所言通商就是商人和园户在官府专门机构的监督下交易,而且必须贴纳政府在行禁榷法时所得的茶净利,这一规定决定了茶叶并非自由通商。这实际是政府间接地垄断着茶叶的收购,并对商人卖茶实行严格管理(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商人卖茶时每斤征200文),其高额的税收(是买茶价230文的两倍多)仍保证了宋政府在实行禁榷法时的专卖利益,已具有专卖税性质。它也就是淳化三年和天圣元年实行的商人直接向园户买茶,向政府贴纳榷茶时的净利,然后到指定地贩卖的“贴射法”。两者唯一的不同就是前者由商人和园户分担茶净利,后者由商人单独贴纳全部净利。由此说明,南宋人陈傅良认为贴射法为刘式所创,天圣元年贴射法皆“复视刘式之意”^⑬是错误的。张洎的主张未立即得以施行,但茶法改革已势在必行。

2. 淳化、至道间的茶法改革

淳化年间淮南和江南茶法都进行了改革。淮南茶于淳化三年实行贴射法,该年七月:“诏淮南茶场今后商旅只得于园户处就贱收买,将赴官场贴射,违者以私茶区别。”^⑧规定商人向园户买茶时必须向官场贴纳茶净利,也就是榷茶时政府所得的专卖利润。行贴射法的目的是以允许商人直接向园户茶来促进茶叶销售,解决停积问题。这次贴射法实行数月即罢。《玉海》卷181载:“淳化四年初行交引,罢贴射。”三十年后的天圣元年(1023)贴射法第二次实行于淮南,其内容与淳化三年所行一样。^⑨《群书考索后集》卷五十七《财赋门·茶盐类》叙贴射法沿革道:“贴射法,宋初许商贾就园户买茶,于官场贴射,谓之贴射法。太宗淳化三年始行之,四年罢,仁宗天圣元年复行之。”说明贴射法先后实行了两次,是十分正确的。可以说这两次贴射法都是张洎向太宗所提建议的付诸实践。天圣元年的贴射法只行于淮南,这在《长编》、《宋会要》等史籍中已有清晰说明,而淳化三年贴射法一直被认为亦实行于江南,持此论者至今有之,而最早提出者为南宋陈傅良。他说:“淳化三年秘书丞刘式起请,令商旅自就园户买茶,于官场贴射,废榷货务。”^⑩其所指显然是江南茶,因为榷货务是江南榷茶机构而淮南榷茶机构为十三山场。那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刘式改法的时间和内容。

刘式改革江南茶法计划的确提出于淳化三年,但其实行是在淮南贴射法废罢的淳化四年。淳化三年八月他上奏“向者朝廷措置缘江榷货八务以榷南方之茶……今四海无外,诸务皆宜废置。”^⑪刘式改法的目的也是解决茶叶停积难售的问题。而此前刘式曾提出过以茶叶用于沿边折中以发售积茶。雍熙北伐“初得并州,又绝和亲,诛灵夏叛旅,有司不能给,颇以扰民。”他认为仅赖官府和边民供给“非长久之利”。他在任潭州茶场和利丰监监官时“见茶积成山,或不能泄,岁久则皆焚弃”,利丰监盐亦停积颇多,“国家据山海之源而不能用,边寇小警,收敞补败,辄以劳民,至上下空匮,甚非计也。臣请通茶盐之利,被之河北关中,国中益赋而民用足。”^⑫倡议以茶盐用于沿边折中。西夏叛宋、收复并州是雍熙二三年事,可知雍熙三年实行的沿边入中正是刘式建议的实施。对此戴裔煊先生在其《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一书(中华书局1981年新版)中已有正确的结论。刘式淳化三年提出的改革办法仍然还是要促进官茶的销售。他指出:“榷务茶陈恶,商贾少利,岁课不登,望尽废之。许商人输钱京师给券,就茶山给以新茶,县官减转漕之直而商贾获利矣。”买茶的方式是“商人赍券诣茶山,官以新茶给之”^⑬,亦即“令商人就出茶州府官场算买。”^⑭而且给商人提供便利,“据地里远近,减下价钱,仍免放自江已南缘路商税,及令严切铃辖出茶处场务不得住滞。”^⑮原来是各产茶州军买茶场将买到茶纲运至榷货务,现令商人直接到各州军场务买茶,官府省却运费、商人可得新茶,于双方都有利。淳化四年刘式茶法改革在江南诸路付诸实践。该年二月太宗乃令:“沿江榷货务并令停废。”并规定“其禁榷茶盐条例并算买交引一切依旧旅行。”^⑯商人入中算茶的程序与未废榷货务时一样。

刘式法仍然是入中交引法,只不过官府向商人批发茶的地点由沿江榷货务改为江南名产茶州军茶场。而且刘式法付诸实行时也正是淮南茶恢复交引法,废罢贴射法时。这不是巧合,而是两地茶法保持了一致。但刘式改法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商客多有疑惑,惮渡江遥运,阻常岁之经营”,要求“须仍旧贯,应沿江榷货务并令依旧。”“改法不及半年,三司较之比亏数已多,遂复旧制。”^⑰又于淳化四年七月恢复了榷货务卖茶制。

淳化四年七月恢复榷货务卖茶后,积茶焚茶的弊端又重演。刘式仍持己见,“式之议已罢,式犹固执。”至道初他再次建议“废缘江榷货务,许商人过江听私货鬻。”^⑱但遭到西京作坊使杨

允恭的反对。杨允恭也看到听任积茶焚茶“非善计”，但因榷货务汇集各地很多品类的茶叶，能满足茶叶主要消费区的北方居民需求。“两河诸州风土各有所宜，非杂以数品，即商人少利”，他“请依旧江北置务”。并用“均色号，以年次给之”^⑧的办法解决陈茶问题。于是在刘式与杨允恭之间展开了一次围绕榷货务废立问题的茶法之争。“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说，命宰相召盐铁使陈恕等与式、允恭定义，召问商人。”^⑨令陈恕主持茶法讨论。

陈恕十分慎重地主持了茶法讨论，“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恕阅之，第为三等。”^⑩将各方意见归纳为三种。其内容在陈恕至道元年八月的上书中较详细的说明：“（商人）须得淳化四年减落价钱，方可过江算买，以此相度，若减价则亏失官中课额，不减则商旅不愿过江，且乞依旧般茶赴榷货务出卖，免亏课利。”^⑪第一种意见就是淳化四年二月实行过的刘式法，陈恕称之为“上等法”，他认为“上等（商人）取利太深，此可行于商贾，不可行于朝廷”；第二种意见是商旅过江算茶，官不减茶价，陈恕又称之为“下等法”，他认为“下等固灭裂无取”，商人无利而难行；第三种就是恢复沿江榷货务集中发卖的旧制，官不减价，商不跋涉，是适中易行之法，陈恕称其为“中等（法）公私皆济，吾裁损之，可以经久。”^⑫实际结果是陈恕支持杨允恭的意见，即史称“陈恕等以允恭议为是”^⑬，“恕等皆附允恭”^⑭。陈恕、杨允恭得到宋太宗的支持，“令三司茶货依旧榷货务出卖，其刘式所奏并不行。”“刘式抗章，辄欲更改”^⑮而无果。茶法又恢复了沿江榷货务集中发卖的旧制。

因陈恕将各种讨论意见归为三等，不少人误将其称为“三说法”，视之为三说法的肇始。这一观点由宋人王应麟最早提出。他说：“至道元年盐铁使陈恕为三说法”^⑯。陈恕茶法是榷货务卖茶制，三说法是沿边折中法，不能混为一谈，这一问题笔者已在《北宋三说法辨析》^⑰一文中作过专门论述，此不赘述。

以上几次茶法改革，不论是淮南行贴射法还是刘式法和陈恕法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解决茶叶积压难售的问题。雍熙三年曾以茶叶用于沿边折中，但规模不大，对茶法基本上未产生大的影响。而随着至道二年茶叶被大量用于沿边折中，茶叶停积问题得以解决，代之以起的主要问题是茶叶的供不应求和茶利的巨大损失。至道二年宋夏战争爆发，边费开支骤增，杨允恭又对淮南盐实行官卖，这两件事都对茶法产生了很强烈的影响。“商人先入金帛京师及扬州折博务者，悉偿以茶，自是鬻盐得实钱，茶无滞积。”^⑱淮盐亦不直接用于沿边折中，原来沿边入中商人“以盐为急，皆竞趋焉，及禁江淮盐，又增用茶”^⑲，“即以茶代盐，而买茶所入不补其给，交引停给，故商旅所得茶指期于数年之外。”^⑳茶叶反而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结果是商人无茶经营，入中积极性下降，政府得不到所需钱粮，“公私俱无利。”^㉑这种问题在真宗仁宗两朝因沿边入中的扩大而反复出现，茶法改革的中心也变为如何有效解决保障沿边军需和减少茶利损失这对难以调和的矛盾。

注：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三建隆三年正月丁亥，清光绪七年辛巳浙江书局刻本，以下同。

②③《长编》卷五“乾德二年八月辛酉”。“置场”：《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同条称“置榷货务”。

④⑤⑥⑦⑧《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五·榷茶》，清光绪二十八年上海鸿宝书局石印本。

⑨《长编》卷六“乾德三年九月己卯”。“十四场”名《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三二、《文献通考》卷十八、《梦溪笔谈》卷十二有载，此略。其中黄梅场景德二年废，此后皆称淮南十三山场。

- 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宋史》卷一百八十三《食货下五》，中华书局 1977 年版（以下同）第 4477、4477、4479、4480、4480 页。
- ⑬《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正月”。
- 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食货三〇之一、三、一、一、二、二、二、二、二，1936 年北平图影印本，以下同。
- ⑲《宋会要》食货三〇之二，沿江八务名可参《文献通考》卷十八《榷茶》，此略。淳化四年废襄、复州二务后通称六榷货务。
- ⑳《宋会要》食货四六之二。
- ㉑可参《文献通考》卷十八、《梦溪笔谈》卷十二，如薪口务受潭州、兴国军茶，无为军务受抚、吉州、临江军、南康军茶等。
- ㉒[宋]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八“上太宗乞罢榷山行放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32 册第 316 页。
- ㉓《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二月丁未”。
- ㉔《宋会要》食货二九之七。
- ㉕㉖《长编》卷三十“端拱二年九月戊子”。
- ㉗以上俱见《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八《财赋门·茶法》，第 315、316、317 页。
- ㉘可参《长编》卷一百“天圣元年正月丁亥”，该记载以舒州罗源场茶为例，说明行贴射法时商人贴纳之数就是禁榷时官卖茶价减去茶本钱后的息钱。
- ㉙[宋]刘敞：《公是集》卷五十一《家传·先祖磨勒府使君》，丛书集成初编本。
- 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宋会要》食货三六之三、三、四、四、四。
- ㉛㉜《宋史》卷三百九《杨允恭传》，第 10161 页。
- ㉝㉞《宋史》卷二百六十七《陈恕传》，第 9202 页。
- ㉟《玉海》卷一百八十一《天圣茶法、影枯茶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947 册第 659 页。
- ㊱拙作《北宋三说法辨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 年第 6 期。
- ㊲《长编》卷六十“景德二年五月辛亥”。

作者：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责任编辑：陈双燕